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三三期 ——
(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610e)

【动态报道】禁不绝的反思和醒悟	林 渊
【研究报告】“文革”时期的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	徐 贲
【史海钩沉】“文化大革命”中的“活人展览”	何 蜀
【难忘岁月】回忆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 ——一个保守派的自述(之九)	刘光耀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动态报道】

禁不绝的反思和醒悟

• 林 渊 •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被简称为《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一词首次正式出现在中共中央决定内，也是继“五一六”通告后，中共从全局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去年初开设于广东汕头市的大陆首家文革博物馆，原定在今年这个具标志性的日子，举行一个反思文革的研讨会，但该博物馆的倡办人彭启安向笔者证实，因种种原因，研讨会无奈取消了，他感谢外界关心和支持文革博物馆的工作，文革博物馆会继续开放，他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人可在自己的土地上，堂堂正正的讨论这场历史灾难！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四十周年，结束三十周年，海外有关文革的讨论和纪念活动于五月中旬达到高潮，除了各地的报章大幅报导，在美国的纽约和德国的柏林，也分别举行了有关文革的大型学术研讨会。海外社会这波“文革热”，使得害怕旧事重提的中共政权，加紧对文革严防设限，即使汕头的文革博物馆计划迟至八月才举行反思文革的研讨会，也逃不过被迫夭折的命运。

曾扬言要在大陆开设文革博物馆的樊建川和刘宗秀，也无法顺利推展他们的开馆计划。四川商人樊建川早在零三年便声称要在四川大邑县兴建博物馆聚落，当中包括抗战博物馆系列、“文革”艺术品博物馆系列、民间百年博物馆系列等。可是展馆在今年六月中开幕，馆名连“文革”二字也不敢用，“文革”艺术品展览变成新中国瓷器展览，展馆的工作人员承认，有官员跟他们联络过，并提出了“建议”！

而现居于深圳的文革文物收藏家刘宗秀，去年底多次向传媒表示，要在深圳建立一所文革博物馆，展出他几十年来的收藏，又说有朋友愿意在今年中借出地方，让他举行一个小规模预展，以纪念文革爆发四十周年。可是数月后，刘宗秀不得不承认自己过于乐观，好些原先支持他的朋友都打了退堂鼓。

尽管困难重重，今年大陆民间举行纪念文革的活动，还是有所突破，除了在三月廿四至廿六日，包括徐友渔、沈迈克、唐少杰等十多名研究文革的海内外学者于北京市郊一个私人场所，举行了小规模的文革座谈会，尚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文革研讨会，于标志着文革正式爆发的五月十五及十六日这两天召开，显示中国学界仍有人敢于打破禁忌，为文革研究迈出不平凡的一步。

这个在辽宁省锦州市渤海大学校园内低调举行的全国文化大革命史料搜集与整理研讨会，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共二十多名研究文革的学者和文革物品收藏家参加，并首度开放该校刚建成的文化大革命史展馆，供与会者参观。

渤海大学的校长秦秋田亲自主持了研讨会的开幕礼，及出席欢迎晚宴。领导人的开明和支持态度，为与会者带来很大的鼓舞，不少与会者都表示，来之前确担心会议会突然取消，或在会上不能畅所欲言。

出席这研讨会的人士，包括丁东、吴思、王海光、罗平汉、刘小萌、定宜庄、老鬼（马波）、张丽娜、王锐、鲁礼安、岳建一、杨健、贺立华、兰传斌、刘里立、王宇英、郭济生、叶维丽、黄维廉、李秀林、刘嘉滨和张宏杰。

筹组今次研讨会的渤海大学历史系主任崔向东表示，渤大不少教职员都是文革的过来人，希望为记录和探索这段历史献出一分力量。历史系三年多前便成立文化大革命史研究所，并着手在校内筹建文化大革命史展馆。到去年底，决定在今年五月中举办有关文革的研讨会，为免会议受到干扰，校方一直低调行事，甚至婉拒了闻风致电来要求采访的中外记者。

会议开始前，主持人先宣读了多名未能抽空出席的学者送来的贺辞或书面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友渔在书面发言中指出，文革是空前浩劫，但最近十年看得出一种趋势，就是美化文革，怀念文革，甚至呼唤文革的人越来越多。现时不少人仍以为文革可带来“大民主、打倒特权、实现平等”等理想，提出“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公然歌颂“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这都是没有认清文革的本质。徐友渔呼吁，要汲取文革的惨痛教训，一旦天下大乱，首先遭殃的会是广大群众。

其后会议以自由发言的方式进行，活跃于出版界的丁东讲述了今年海内外有关文革研究的最新动向，并提到在三月廿四日至廿六日，他和十多名海内外学者在北京郊区举行的文革座谈会，而今次渤海大学召开有关文革的研讨会，可说是开创大陆学界的先河。

吴思表示：今年五月号的《炎黄春秋》发表了五篇颇有分量关于文革的文章，但标题都没有使用“文革”二字。来自四川的王锐老先生，则谈到他对文革初期一个特殊机构“首都工作

组”的相关研究，而北京的博士生王宇英，以自己正在撰写的博士论文为题，对文革时期的家庭政治化问题做了扼要的阐述。

各与会者的发言，大致可归纳为以下要点——

一．对于“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在西方”这说法，中国人应感到羞愧和难过，抢救文革史料，人人有责。

二．文革史料要进一步发掘、整理和核实。

三．文革研究应开展新角度，开拓不同的领域。

四．一个伟大的民族应有勇气面对历史，反思错误。

为文革研究默默耕耘的渤海大学，由具五十多年历史的锦州师范学院与辽宁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合并而成，于二零零三年正式命名及启用欧陆式设计的全新校园，属辽宁省的重点高校。校方把政法楼的其中一整层，约三百平方米，辟作文化大革命史展馆，除了用图片、文字和文革收藏品展现这段惨痛历史，还有先进的影音器材，把文革的纪录片投放在巨型银幕。另外，该校的图书馆亦辟有专室，收藏文革小报及相关的文字数据。

与会者都对校方的开拓精神和努力十分赞赏，这股学界清流能否静水流深，突破“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在西方”这一困局？看来仍有待各方共同努力！

~~~~~

【研究报告】

“文革”时期的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

• 徐 贲 •

在物欲横流、贫富悬殊、官贪政贿的今天，“文革”被部分中国人想象为一个与当今的“物质主义社会”截然不同的理想时代。有人认为，当时的中国，虽然生活物品匮乏，但却是个分配公正的社会。这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史实，经历过“文革”的人也许会按照各自的经验和不同的现实处境产生不同的看法；而不曾有过“文革”生活经验的人则凭自己的偏好和需要自由发挥。我觉得，反思“文革”时期的物质文化，不能光凭个人经验或印象，而应从物质文化的基本结构入手，才可能比较清晰地看出文革时期物质文化的特点。

与在任何特定社会中一样，“文革”时期的物品所满足的并不只是人的自然需要，而是一种由当时社会和政治文化所理解为“正当”的需要。这些需要是如何形成的？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国家以何种正义原则以及为何种目的去满足这些需要？这些原则和目的今天是否还具有正当性？这些话题正是今天探讨“文革”时期物品分配的关键所在。

概言之，“文革”时期的物质文化可以分成三个方面来讨论，其一是从社会政治文化看物品的文化价值和“时尚”作用，其二是物品使用与消费者的“仪式”行为，其三是“文革”时期的“分配正义”问题。

一、从文化世界到物品：“文革”期间物品的夸示性、表演性联想

从文化世界到社会等级身份的标志物品，其间的意义流动是一个时尚化的过程。在生活世界中，观念必须通过具体的物品才能获得具体的表现，物品的符号意义本身就是由来自社会的正当性理由所支撑的。（1）

当我们按照物品的社会意义使用物品的时候，社会秩序变成了一种必然的道德秩序。一件物品之所以获得某种社会意义，是因为它和外在于这个符号系统的某些社会概念或价值联系在一起。例如，一件军装在“文革”时期有“革命”的符号意义（鲍德里亚称之为 *alibi*，即托词），这是军装在其它社会中所没有的意义。在“文革”中，物品的普通正当理由如“满足生活需要”之上更有一种特殊的正当理由，即“革命”、“无产阶级”等等，最具正当理由的便是“革命需要”、“革命用途”、“革命作用”等等。（2）

正因为如此，物品在“文革”中具有极强烈、极明显的表演功能。这种表演有两种不同的形式：夸示和联想。夸示性表演往往需要借助文字和图画来表现，而联想性表演则更侧重于当时被普遍接受的正当需要观念。因此，虽然联想性表演不如夸示性表演那么显见，但它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让我们看到，当人们按照物品的社会意义使用它的时候，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按照这些意义的社会规定再生这个社会秩序。例如，“文革”时的住房外都写着革命标语，画着毛泽东的画像，这便是夸示性表演。当时住房极其紧张，仅有的少数新造住房也十分粗陋，但比起那些1949年前遗留下来的考究住宅（西式或中式），粗陋的住房却有远为优越的联想意义——艰苦朴素。那些不具此联想意义或具有相反联想意义的西式洋房，无论画上多少毛的头像，写上多少革命标语，都不可能在联想层次上具有与粗陋房舍同样的表演效果。“文革”期间，朴素和考究的关系不是彼此不同，而是有此无彼。使用朴素物品成为正确使用物品和使用正当物品的唯一方式。一切明显的考究精致的物品都会立即被联想到奢侈和资产阶级，给使用者招惹许多麻烦，尤其是当使用者本人已被归入政治上不可靠的属类。

然而，“文革”物品的使用本身又存在着一种悖论关系，即普通社会成员均受到物品的这两种表演性限制，而权位越高者却不受其约束。比如，党和国家领导人照样可以住在中南海或高级住宅区，照样可以看外国电影，读“封资修”书籍，等等。可以说，“文革”物品对“艰苦朴素才革命”的表演是为一般普通人设计的，其作用是将他们极端匮乏的物质生活变为一种合乎道德的生活方式。对于一般人，“越穷越革命”成为他们所知道的唯一合乎道德理想的社会状态。

在“文革”的物品世界中，并非所有物品都具有相等的夸示性和联想表演功能。不同物品结合这两种表演性的能力也不尽相同。如上面提到的住房，它的两种表演性之间只有松散的关系。“文革”期间的大多数物品也都是如此，没有很明显的联想表演性，如文具盒、作业本、脸盆、毛巾、饭盒等。这些物品往往只能靠革命图像和文字的夸示表演来凸显它们的意识形态意义。这些物品的夸示性表演还表现在它们的品牌名称上，如“红星”、“红波”、“卫东”、“东风”等，甚至出售它们的商店名称也体现出夸示性表演，如“五七杂货店”、“红卫文具店”、“长征药店”等。还有一些物品，其暗示性意义与革命夸示表演相冲突，因为它们本身就带有坏的联想意义，如金银首饰、西式服装、宗教用品、古董字画等。这些物品因此成为“破四旧”的对象，谁若用它们去展示革命的图画和文字，那就会被看成居心不良、诬蔑革命。再有一种物品，它们的正面暗示性极强，几乎不需要夸示性表演就能展现极强的革命意义，如军装、毛像章、语录、枪等。

物品的表演功能与社会等级观念紧密相联。越值得公开演示的，其社会价值越高，也是高等级身份者所“自然”拥有的。程文超在论及“文革”中的“军用品”时这样写道：“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用上军用品的。……那年月，并非军人家属、能用上军用品的，大有人在。这才是本事！你得有地位、有身份、有关系、有路子。……比如，穿上一双‘解放鞋’，是一种身份、地

位的表征。‘解放鞋’，将你和穿一般球鞋的人区别开来，它显示了人物的身份、背景等鞋之外的很多意义。因而在那时，‘解放鞋’与一般球鞋之间，有一种等级、一种特权。”程文超当知青时，农村里经常搞政治运动，一有运动，就会拉几个“地富反坏右”出来批斗一番。有一次，队干部正准备将一个劳动不积极的人定为“坏分子”拉出来批斗，却发现他穿了一双新“解放鞋”。干部们想，他是不是有什么背景？有人说是他有一位远房亲戚早年被国民党拉了壮丁，后来参加了解放军，当了官儿，最近联系上了。就这么一个传闻让他躲过这一劫，“那场批斗却落到了别人的头上。那时的坏人，被压在社会最底层，是不可能穿上‘解放鞋’的。而穿上‘解放鞋’的，就不可能是坏人。今天，没有经过‘文革’的一代人，怕是很难理解，鞋里，还能藏着这样的政治玄机！”〔3〕

一般现代社会中的物品往往通过广告和时尚这两种途径被赋予特殊的象征意义，巴尔特为之称作大众文化制造的“神话”。时尚把物品原本属于文化范畴的价值（美丽、尊贵、地位等）转化为物品的自然属性。例如法国香水夏奈尔5号可以变为高贵、典雅和美丽的化身。时尚的反面还有逆反时尚。时尚引导者往往是社会上层名流，他们喜爱的物品成为他们优越地位、丰厚收入和高雅趣味的象征。逆反时尚引导者则多为社会边缘群体人物，如嬉皮士、朋克、同性恋者等。他们的文化因激进、新奇和反叛而变成一种另类时尚。〔4〕

在“文革”时期，可以表演“革命”身份的物品成为一种时尚。具有代表性的“文革”物品，如军装、工装、毛像章，它们的象征意义化过程就是一个时尚化过程。带动这种时尚、起广告作用的是报刊广播等“革命”宣传、“样板戏”和许多“重要事件”，如毛泽东穿上军装、戴上红袖章接见红卫兵，这时毛本人成为时尚的最高引导者，而他同时也代表边缘身份（“造反派”、“老大粗”）的逆反时尚。

“文革”时尚与一般社会时尚之间存在着几大差别。首先，除一般时尚的诱导手段之外，“文革”时尚还加上了暴力和恐怖手段。一般时尚，如到麦当劳吃快餐，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去还是不去，但“文革”时尚是不允许这种选择的，它体现的是绝对的强制性。“文革”时尚的强制性主要表现在对违背时尚者的严厉惩罚。“破四旧”、“抄家”以及许多“斗争会”就是以使用错误物品为理由采取暴力行动的。即使是不小心误用了“革命”物品，无心之过也可能给人带来牢狱之灾，如把“小红书”放错了地方，不当使用了印有毛泽东头像的报纸，吃了猫（猫谐音毛音）肉等。时尚物品的使用更被用作区分“自己人”和“敌人”的工具。例如，关在“牛棚”里的人是不能穿军装的。识别一些时尚物品的“内部”差别，如军衣的干部装（四兜）和士兵装（二兜）的差别，更是能让时尚者感受到自己是“内行人”的心理满足。

第二大差别是“文革”时期的革命时尚直接与统治权力挂钩。研究一般物品意义和一般时尚者大都指出物品使用在维持社会等级秩序中的作用。这是一种无须统治权力直接介入就能维持的秩序，故常被称为“意识形态”的作用。意识形态在一般社会中是统治的无形之手，但这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并不完全适用于“文革”中的中国。“文革”中的革命意识形态由国家权力所设计，并通过国家机器的暴力和恐怖手段加以贯彻。“文革”中的极权意识形态设计并构建了当时的文化世界，物品成为这个文化世界最明显、最日常生活化的反映和记录，也成为专制国家政权暴虐统治的直接工具。

第三大差别则在于追求“文革”时尚可带来某种安全感。在“文革”极权意识形态下，人们追求“文革”时尚往往并非喜好物品本身，而是以物品为手段来达到某种目的，即获取人生安全感。在一般社会中追求时尚的过程分两步：第一步是从物品到某种可见的社会身份品质，如从贵重物品到“富有”，从优雅物品到“学问”或“品味”；第二步则是从社会身份品质到人生便利，尤其是人生安全感。追求“文革”时尚与一般社会的追求时尚之区别在第一步，不在第二步。在一般社会中，物品之所以能起到区别社会等级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物品与金钱的关

系，物品越贵重，使用者的身份越高；具有追求价值的物品（时尚物品往往是这一类物品）所寓寄的令人羡慕和向往的品质包括财富、地位、荣耀、学识、美貌等。而“文革”中的时尚物品与一般社会的完全不同，因为“文革”中许多一般社会的贵重物品（金银、古董、高级衣物）具有负面联想意义，成为人们急欲躲避（至少是不敢公然追求）的物品。但这种差别仅仅是表面现象。“文革”时期，人们追求的最终也是人生的安全感。“文革”中，远非所有的人都能享有这种人生安全感。这才是“文革”社会等级极大差别的关键所在。

在一般社会中，生活中令人羡慕和向往的东西包括财富、显贵出身、名声、学问、教养。一个人有了这些，就能获得人生安全感（不受侵害、满足日常需要、尊严、自由、随心所欲、对未来有信心等）。人们追求人生安全感这一生存需要在“文革”期间并未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那些可以获得人生安全感的手段。“文革”时期，财富、学问、某类地位（如学术）和声名不仅不再能带来人生安全感，反而构成对这种安全感的危害，它们当然也就不再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相反，一般社会中那些被人瞧不起的品质（贫穷、愚昧、没教养、卑微出身等等）反倒成为获得人生方便的条件。尊卑的表面颠倒使得“文革”时期的物品使用比一般社会中更具一种特殊的表演性、假面性和矛盾两重性。“文革”中，参加抄家的人侵吞抄家物资，只敢私藏，不敢显露，就是矛盾两重性的体现。

“文革”社会看来颠倒了一般社会的等级标准，使得原先的优等阶级变成了劣等阶级，但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社会等级标准并未发生变化。“文革”社会和其它任何社会一样，谁享有人生安全感，谁就是优等阶级。在一般社会中，最能享有人生安全感的是拥有金钱的人，因为金钱是各种不同社会利益的交换手段。在“文革”中，享有人生安全感的是拥有暴力权力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权力可以支配一切社会利益。“文革”中最具正面符号价值的正是一些与暴力权力有关的物品，军装、印有最高统帅毛头像的物件、代表他的思想和意志的书籍等。军事组织既是暴力机器，又是暴力价值的象征。“文革”中的社会军事化是与当时文化世界范畴和价值的敌我二分对立化同时发生的。军事禁欲主义和当时的物质极端匮乏汇集在一起，形成了“文革”时期特殊的物质价值秩序。

## 二、从物品到物品消费者：“文革”中的仪式化消费行为

从物品到物品消费者，其间的意义流动是一个“仪式化”的过程。人们在使用仪式化物品的过程中维持或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形式关系。最常见的仪式化物品使用包括送礼、宴请、炫耀（展现自己的所有物）、请客或出客、节日或婚嫁、庆典等。在仪式化消费行为中，物品成为“交际物品”（communicators），物品的流动往往起到标志和巩固复杂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等级关系的作用。我们不妨用“文革”期间的“赠送”和“占有”这两种仪式为例，来看一看物品消费与当时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

“文革”期间的公开赠送主要表现为“嘉奖”和“福利”。单位对“先进个人”送“毛选”、奖状、笔记本等，但不送“红包”，这标志着重精神、轻物质；但另一方面，过年过节又会给职工送毛巾、肥皂、劳保用品、食堂配菜，以标示领导和组织的关怀。赠送实物而不赠送金钱，看起来相似，实际上却有重要区别：发实物是自上而下地设想和规定人们的需要，发什么物品、发多少，都是“组织”的事，组织给你什么，你就需要什么，人跟人的需要是一律规定的；发金钱则不同，那是允许人们自由设定需要，决定不同需要的主次并决定将这些需要满足到何种程度，每个人领到同额的奖金，根据自己需要购买的物品肯定不会一样。“文革”中常有发的物品用不掉，需要的却又不发的情形。赠送与需要的脱节使得赠送成为一种表示上级关怀的仪式。

“文革”期间，金钱的作用还受到票证分配物品制度的限制。“文革”中托人办事，每每请客吃饭、送礼，但不送钱；送钱是明目张胆的贿赂，一旦抖露出来，钱便是罪证。送实物及请

客吃饭则不同，那属于“人情难却”，所以往往是半公开的。请客送礼一般限于食品和烟酒，当时这类礼品的实际价值比现在要高，因为都是定量供应的，就是有钱也未必买得到。请客送礼是一种非冠冕堂皇的半公开行为，它是对所请所送的人表示尊敬、亲近的仪式；太生疏的关系是送不上礼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得转托他人。受礼者当然是有权势地位、有能力替人办事的人。和单位“赠发”物品一样，托人办事的请客送礼是一种增进社会关系或人际“亲近感”的方式。在物品稀缺的“文革”时期，人们出于利益交换的考虑，不得不把自己的那一份定额物品“赠与”有权有势的人，用来换取关照。

“文革”物品的使用也同样表现为仪式性消费的另一重要形式，“占有”。一般社会中的占有仪式在“文革”中往往不再有效。“文革”中抄家、破四旧的对象往往就是那些被别人知道家里藏着“好东西”的人家，所以一般社会中的占有仪式恰恰成为“文革”时期的大忌讳。“文革”中人们有很强的分辨意识，知道哪些是可以让人看的东西——有正确意识形态联想意义，哪些是不可以让人看的东西——有“反动”意识形态联想意义。这是当时物品使用的占有仪式的基本条件。在区分人际关系的亲疏时，占有仪式比送礼仪式更重要——不能给外人看的东西往往是可以给亲人或极好的朋友看的，例如，“文革”时传借“禁书”就是在极小范围内的占有仪式行为。

“去占有”也是仪式化占有的一部分，或者说，仪式化的占有包括仪式化的“去占有”。“文革”中有一些特殊的“去占有”仪式，如将祖传的文物或住房“捐献”给国家，自破“四旧”，烧毁旧照片和保存多年的物件，或刻意穿着朴素，以及其它种种避免“露财”的做法。“去占有”是一种公开表演，表现原占有者与自己过去所处的群体或者本人的历史“划清界线”，成为一种对个人记忆和经历的自我否定。在一般社会中，人们会尽量通过占有来保存个人记忆和经历记录，因为物品的情感价值本身就是占有的一个目的。人们珍视旧宅、旧物件、收藏和旧照片等，并非是因为它们有经济价值或使用价值，更多的是因为它们有记忆和情感价值，强迫人抛弃旧物是极具伤害性的。“文革”以后，许多人痛感家庭或个人记忆失落，很大程度上缘于被强迫放弃占有旧物。社会群体也有类似的“去占有”遭遇。历史纪念物或建筑可以说是集体性的占有物品，它们在“文革”中遭到破坏，其实也是一种集体性“去占有”的结果。今天的普遍怀旧情绪，包括恢复这些建筑，则是再一次的占有仪式行为。

“文革”中不同形式的占有是社会等级秩序的一个重要标志。一般人享有物品必须先占有物品，而有特权的人则不必占有物品就能享用物品。因此，身份的高低并不全在于实际占有物品的多寡，而在于虽不直接占有就能享用物品。这种不占有就能享有才是一种高等的“拥有”。真正有“身份”的人不需要展示他们的占有就能让人明白他们的享有，他们有“公家分配”的住房、汽车、家具、服务员、警卫员。这一切都是与官职、权力、地位联系在一起的，一旦失去官职，所有“待遇”立即取消。在这种情况下，官职、权力就成为社会等级的根本标准。而官职权力的来源乃是一个以至高无上的王权为中心，以对它的绝对效忠为条件的官僚体制。这是千百年以来存在于中国的文化世界和社会秩序。在这个文化世界中，与官位权力相比，钱只是一种次等的权力，前者比后者高贵得多，因为前者能办到后者办不到的事。（5）

“文革”期间比任何其它时候都能说明“需要”如何受制于等级地位。需要其实就是“正当需要”，而“文革”期间“正当需要”是严格地跟身份地位走的。你是“首长”，你住的地方离你上班的地方再近，你都有坐小车的“正当需要”；相反，你若是百姓，你住得再远，你也不能有这个“正当需要”。“正当需要”证明“待遇”的合理性，待遇体现的就是理应得到满足的正当需要。（6）

“文革”中，不只是人的物质需要，人的其它需要，如感情、娱乐、审美、求知等，都是由政治权力严格规定的。仅就物质需要而说，“文革”中的衣和食都实行定量供应，政府不仅规

定国人有多少种基本需要以及每种需要应该满足到什么程度，还规定以什么物品去满足这些需要，如每人每月可食用多少粮食以及粮食种类的搭配。政府因此宣称它满足了所有人的同样需要，因此具有统治合法权威。这是一种“对需要实行专制”的模式（7），它的控制可以遍及人的一切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和性需要。“文革”中的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是限定基本的生命需要。那时，一切不在国家权力限定范围之内的需要都是不容公开道出的，稍有流露就会以“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罪名受到打击。

“文革”的票证分配制度比任何其它制度都清楚地表明，需要不再是自然的；当人们在生活中彻底失去自由意志决定的时候，他们不可能知道自己“自然”需要什么。吃和穿看起来是“自然的”生理需要，但“文革”中政治权力对生理需要的直接干预让我们充分看到了哪怕最自然的生理需要，也不那么“自然”了。就以“不饿死”这个吃的基本需要为例，作为政治活动的“吃忆苦饭”就是以最低等的一种比较在规定“吃”的基本需要，而且“吃忆苦饭”被政治权威赋予了一种道德意义。有了这种低标准比较，“文革”中极低限度供应的物品就具有“幸福生活”的文化意义了，因为据官方说，“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们所吃的食品和所穿的衣服不只是在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恩情”；人民之所以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全是因为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人民的缘故。

在“文革”的政治环境中，“需要”成为满足低程度生理本能的代名词。以这种方式来看待人的需要包含着对人的极度贬抑，这和当时政治在其它方面对人性的极度扭曲和摧残是同时发生的。正如伊格那蒂夫（Michael Ignatieff）所说：“关于人的需要的理论，也就是言说人之为人的语言。用需要来界定人性就是用我们人类缺乏什么来界定我们人类是谁。这也就是坚持人类与其它动物相比有一些特殊的（需要）。”（8）

“文革”期间人的需要被政治权力限制到了与动物几无区别的程度。控制人的生存必需，如一切票证跟着户口走，成为控制整个社会最得力的工具。

长期以来，中国人在“需要”上受到的控制不只表现为物质的极度匮乏，而且更表现为人的基本需要仅仅局限于满足于动物性的生存本能。这种需要观极度扭曲了任何一个正常社会所必须重视的人的其它需要，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爱和群体归属感。索勃（Kate Soper）指出，需要是一种关于人的存在的价值判断，我们是用人的需要的合理性去判断一个社会的“经济生产和消费方式”的。（9）而在一个无法讨论人的需要，或者缺乏这种讨论能力的社会中，人们是很难就他们的公共生活和社会理想有建设性看法的。同样，在一个人们不能以公民的身份自由、理性地参与政治社会活动的社会中，他们也永远没有机会讨论他们的需要和培养这种讨论能力。专制权力长期严酷控制需要的后果是社会形成需要共识的机能严重衰退。一旦政治权力强加在物质需要上的禁欲限制解除了，整个社会立刻无条件地接受金钱的左右，摆向了物质纵欲的另一极端。金钱和欲念于是成为驱动人们物质生活的唯一动力。

“欲念”（desire）和“需要”之间是有区别的，人可以“欲念”他并不需要的东西，也可以需要他并不“欲念”的东西。（10）“文革”期间，欲念和需要的关系完全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人“欲念”的东西，如美、人际亲密关系、感情和信任关系，甚至稍精致一些的食物、衣物、用品，专制权力都可以武断地将之规定为人并不需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因此成为“奢侈”，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追求”。今天，这种政治规定被解除了，但是欲念和需要的关系滑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凡是一个人的“欲念”的，都是他个人的正当需要。

“文革”期间和现今中国的物品世界虽然看上去已经判若天渊，但它们都缺乏关于需要的社会共同理性思考，这一特点延续至今。正如度依尔（Len Doyal）和高夫（Ian Gough）在



《论人的需要》中指出的那样：“人的需要既不是个人自己最能决定的主观偏好，也不是经济计划或者政党官员所规定的那种基本供应。需要是普遍的，也是可知的。我们关于需要是什么的知识，关于需要什么来满足需要的知识，是不断变化和需要讨论的。”〔11〕只有在一个人人们相互关爱、相互认同、彼此以同等的人相互对待的社会中，才能形成关于群体共同需要的社会正义共识。当这样的共识转化为社会规范的时候，人们会在道义层次上感觉到约束自己过度欲念的必要，会更加要求公共政策充分重视社会中每一个人，尤其是社会弱者的需要。

### 三、“文革”时期有分配正义吗？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扩大的社会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暴富者的炫耀性消费和挥霍无度，社会弱势群体的日益贫困无助，让很多人注意到现今社会与“文革”社会之间的巨大差别，以为“文革”时期的物质分配比现在公正。他们所举的例证基本上都是当时的票证物品分配，也就是一种看上去很公正的用同样的需要满足社会成员的制度。其实，判断“文革”时期的分配是否公正，不能仅靠与不公正的现在相比较，这有一个标准问题。在此可以用两种比较有影响的、因此比较普遍运用的分配正义标准来检验一下“文革”的分配正义，然后再用“文革”时期的制度价值来检验一下它的平等原则，从而判断“文革”时期分配中的问题。

第一种普遍运用的分配正义标准是以同等“财产权利”为原则的分配标准，或公正标准。〔12〕按照这个原则，物质分配不是以平等的需要，而以每个人对自己需要的理解、优先次序和满足能力为基础。一个人的财产只要来路正当（通过合法的遗产、正当的收入等），怎么使用都属正当。选择过奢华的还是朴素的物质生活，那是他自己的事。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分配正义。它建立在实用的基础上，即个人财产受保障，自己的财产自己支配，旁人不得侵犯，也不得指手划脚。这样，每个人的财产虽不平等，但支配财产的权利却是平等的。按照这一标准来看，“文革”期间的物质分配显然是非正义的。当时，即使一些在“文革”之前被承认为正当来源的财产（如工资、定息和房产）也可以被任意剥夺，更不要说各种各样的“抄家”、“降薪”或者“停发工资”了。正当收入得不到保障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劳酬脱钩，多劳不多得，高贡献没有高收入，这本身就是对通过劳动应得的正当收入即合法财产的剥夺。“文革”时的“平等”其实是建立在正当财产无法律保障的基础上的。从同等财产权利的角度来看，当今许多富人的财产来源是否有正当性才是讨论分配正义的关键点。

第二种分配正义标准是以“同等人生机会”为原则的分配正义。〔13〕同等人生机会不是指每个人的工作、收入、社会地位一律平等，因为在现实社会中这些方面确实存在着不平等，正是因为这些不平等，才必然有竞争。同等人生机会是指平等的竞争机会，这包括不剥夺任何人竞争的权利和为那些可能输在起跑线上的竞争者（社会弱势群体成员）提供更好一些的机会。这一分配原则要求国家发挥一定的作用，如决定基本福利政策和行使平权法案。这一分配原则还坚持，在基本福利需要之外，国家无权干涉社会成员在需要和需要满足问题上的自主权。从同等人生机会的原则来看，“文革”时期的分配也是非正义的。当时的人按阶级等级划分成“三六九等”，在起跑线上已极不平等；就业和升学这些重大机会更是明目张胆以“出身好”为条件来实行“正当”歧视。当时的国家确实以“定量”为行政手段来保证食和衣的极低限度供应，国家职工也都享公费医疗，但都是最低标准的。中小学虽免费，教育质量却得不到保证。人们不满“文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不满意当时生活资源的高度匮乏，这是“奔小康”口号在“文革”后极有号召力的原因。除非出于“大家穷”比“只有我穷”好的心态，否则，即便是现今生活贫苦者，单从满足物质需要而言，恐怕极少有愿意回到“文革”时代的。

最后再用“文革”时期的公正原则来检视它是否符合其自设的公正标准。“文革”时期的分配原则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的前提是：所有人的需要和需要结构是同样的；只要给人们以等量的物质，他们的满足程度也是一样的。从这一原则出发，认为“文革”物品分配比较公正者

会说，“文革”中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很低，但分配却是公正的，获得的满足也是平等的。但实际情况是，平均主义其实并不可能做到它自设的“绝对平均”，因此也就不可能具有它自称的正义性。

平均主义强调同等需要同等满足。什么是“同等满足”呢？同等满足可以指两种不同的情况：一、同等地满足所有人的某些同样需要；二、所有人不管有什么需要，都必须同等地满足（对所有的需要满足到同等程度）。显然，“文革”中的同等满足指的是第一种情况，那就是在极有限的衣、食范围中的同样需要。当时限量的粮票、油票、肉票、豆腐票、布票等从形式上维持了这种“同样需要”。姑且假设当时所有的人都有同等购买这些定量的能力，这样的分配原则本身是不是公正呢？

我们不妨以最理想的情况打一个比方。有一个10个人的群体，其中3人吸烟。可以假设他们对食品都有相同的需要，但对香烟却不是这样。他们把食品分成10份，把香烟分成3份。这样做的前提是，这些人的需要并不相同，吸烟者有额外的需要。这样看起来很平均的分配其实不平均，因为吸烟者事实上比其他人从共同资源中取得了更多的东西。还有另外一种平均分配的办法，就是把食物和香烟都各分为10份。这就会发生以下两种情况：一是有的人得到香烟但没有需要，因此可用烟与吸烟者换食物，造成事实上不平均的分配；二是有的吸烟者会用自己的食物去换香烟，这样，对食品的同等分配却不会产生同等的满足。以上两种情况都不符合同样需要同样满足的平均主义原则。也就是说，绝对平均主义其实并不平等，绝对平均主义分配其实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不平均分配，它并不具备它自己标榜的正义性。何况，这10个人的实际情形可以比上述情况更复杂。比如有人有病，需要额外的食物份额恢复健康；有人干活比别人重，需要更多食物；有的家庭有成长期的孩子，这个群体有优先保证孩子的道义责任等。所有这些实际情况都会使得同样需要同样满足的平均主义原则变得更加不公正。在理想状态下，10个人分两种物品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社会分配多种多样的物品？

事实上，“文革”中的平均主义本身就是以极不平均的人群区别为基础的。例如，城镇居民每人有定量的油、粮、副食品，每户有定量的煤、香烟，而农村人口就没有。当时在广大的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农村，生活极度贫困，物质匮乏，这只是在“知青”下乡后才逐渐为城里人所了解。在农民的眼中，当时城里人过的已经是“享福”的生活了。即使在“享福”的城镇家庭之间，又何尝有过真正的平等？以子女插队为例，没关系的人家几个孩子都只能下乡“插队”，有关系的则可能安排子女进工矿、参军或当工农兵大学生。当时，“知青”的口粮来自生产队，不同的生产队一年分粮有多有少，“知青”口粮不够，还要靠家人从城镇定量中贴补。此外，农村干部随意到“知青”家中吃喝，“知青”的开支和招待干部用的烟酒，往往也得指望城里“知青”的父母家里从定量供应中节省出来。由此可见，物品的个人或家庭支配量并不是以平等分发多少粮票、布票、香烟票可以衡量的。“文革”时期，除了食品之外，其它日用品（从洗澡盆到家具、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也都是凭票供应，票券掌握在有权的人手里，成为他们满足自己额外物品需要的手段。“文革”中物质分配的许多不公正都被徒具形式的平均“定量供应”所掩盖。把“文革”时代的物品分配认作平等分配和公正原则的体现，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文革”比任何其它时期都更清楚地显示了消费物品和行为在改变和再生社会秩序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文革”时期物质文化和政治、社会秩序特征向通常的消费文化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有挑战性的问题。一般的消费文化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般的、相对稳定的文化。“文革”的情况和一般消费文化理论所观察的完全不同，“文革”物品几乎是一下造就了一个新的文化世界，变化之激烈前所未有。“文革”物品秩序和文化世界在与“文革”前时期的暴力决裂（革命、“造反”）中获得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使得一般消费理论和社会变迁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解释能力。就“文革”与“文革”前时期社会秩序的关系而言，并不是物品消费的变化造成了社会

秩序的变化，而恰恰是社会秩序和文化世界的剧变造成了物品文化范畴和价值的突变。如何从这个根本特征去进一步认识“文革”时期的物质、物品文化，尚待消费文化研究作进一步探讨。

注释：

〔1〕Roland Barthes, *Elements of Semiolog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7); Umberto Eco, *A Theory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Jean Baudrillard, *Le système des objets: la consommation des signes* (Paris: Denoel-Gonthier, 1968);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St Louis, MO: Telos, 1981)。

〔2〕将物品的“需要”、“用途”、“作用”去自然化，可以揭示物品在任何社会秩序中所起的等级区分作用，这是80年代以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为对象的文化批评所作出的一个主要贡献。在批判资产阶级文化这一点上，“文革”与西方文化批评有一些共同之处；但二者间的区别似乎更为重要。“文革”期间的批判资产阶级是为极权暴力政治服务的，而西方文化批评则不是。“文革”的“批资”形成了一个以“革命暴力”为价值中心的社会秩序，这个暴力社会秩序是“文革”物品意义的文化背景。认识“文革”的物品文化，需要的不只是了解一个单纯的、文本性的符号系统，而更是那个使它为暴力专制服务的政治社会秩序。

〔3〕程文超，“波鞋与流行文化中的权力关系”，《文化研究》，2002年第3期，第240页。

〔4〕Grant D. McCracken, *Culture and Consump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81。

〔5〕在封建王朝时代，君王官权等级与物品使用等级有直接的关联。皇帝使用的物品，从颜色、品质到数量都直接成为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公卿百官无不在物品使用上与普通百姓有尊卑上下之分。但即使他们也都必须占有物品方能享有物品。为了尽量享有物品，就必须有尽量大的占有能力，那就是钱，贪污受贿由此而起。与“文革”时相比，今天除非官位特高，不占有便能享有、拥有（“公家分配”）的物品已十分有限，钱又重新成为为享有而占有的主要途径。官员的贪污受贿重新又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焦点。现在有人说，毛时代的官员不贪污，其实是那时他们根本用不着贪污就能过得很好。

〔6〕Ignatieff 以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一剧说明需要和身份等级的关系。李尔王被废黜以后，在旷野上与野兽为伍，方才明白，当年他贵为帝王时的那些“正当需要”其实是多么荒唐。文革中，许多养尊处优惯了的“高层人士”在牛棚、干校和下放处境中的体验，想来有相似的“需要教育”效果。Michael Ignatieff, *The Needs of Strangers*. New York: Elisabeth Sifton Books, 1984, pp. 25-53。

〔7〕Agnes Heller, *Beyond Justice*. New York: Blackwell, 1987, p. 186。

〔8〕出处同注〔6〕，第14页。

〔9〕Kate Soper, *On Human Needs: Open and Closed Theories in a Marxist Perspective*. Sussex, UK: The Harvester Press, 1981, p. 2。

〔10〕出处同注〔6〕，第14页。

( 1 1 ) Len Doyal and Ian Gough, A Theory of Human Need.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1991, p. 4.

( 1 2 ) 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pp. 15, 61.

( 1 3 )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5, 60-61.

□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3期(总第94期)

~~~~~

【史海钩沉】

“文化大革命”中的“活人展览”

• 何 蜀 •

在中国古代，除去有将犯人斩首示众的作法外，还有将未处死的犯人枷首示众、站笼示众、游街示众等作法。在自诩为“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文化大革命”中，却不但没有摒弃“示众”这类本属于“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作法，反而变本加厉地“发明”出了“活人展览”。

“文化大革命”中的“活人展览”，据笔者所见到的文字资料，最早的是1966年9月至11月间发生在宁波市的一次，据《宁波大事记》记载：“9月1日 市政协委员、藏书家朱赞卿被抄家，以其所藏古籍、古画、古砚等为‘罪证’，举办破‘四旧’和朱氏活人展览，延续至11月16日。”〔1〕

众所周知，“文革”初期的“破四旧”时期，全国各地基本上都还是在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之下开展“运动”的，当时那些喊着“造反有理”口号进行“破四旧”的红卫兵，不但得到各地党政机关的热烈支持，而且大多是由各地党政领导授意或直接部署组织起来的（即所谓“官办红卫兵”），“破四旧”的抄家行动也大多是在各地基层党委及公安派出所支持或组织下进行的（有的抄家对象名单就是由各级党委拟定或由公安派出所提供的）。据同一《宁波大事记》记载：“9月4日、10月8日 市委、地委先后成立文化革命小组。”可见此时宁波的“运动”仍在市委、地委的领导之下。对发生在这一期间的“活人展览”，当地党政领导是有责任的。

据笔者所知，最有名的一次“活人展览”，是1968年发生在杭州大学地理系的一次。它的出名，是因为在“文革”结束后“整党”期间的1984年，先被《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谴责，随后又被《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点了名。

1984年4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由卢良、叶辉署名的记者来信《“文革”中在杭州大学搞“活人展览”的个别人至今仍坚持极左的错误观点不改》，文中写道：“这年冬天，他们别出心裁地搞了个骇人听闻的‘活人展览’。七位老教师被当作‘牛鬼蛇神活靶子’，在展览馆‘展出’。他们用极端侮辱人格的办法来丑化这些老教师：胁迫有的教师穿上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小帽，腋下夹着账本，化妆成地主；有的身着旗袍，足蹬高跟鞋，涂脂抹粉，化妆成资产阶级太太；有的脖子上挂着串起来的卡片，一手拿剪刀，一手拿胶水，冠之以‘不学无术的反动学术权威’；让当时的系主任打着黑伞，象征‘牛鬼蛇神’保护人，封之以‘活阎王’的绰号。他们还专门派讲解员，用侮辱性语言讲述这些同志的所谓‘罪状’。这个展览会轰动一时。

系里五十八名教职工中有二十人遭到批斗审查，被扣上了各种政治帽子，受到不同程度的侮辱和迫害。”

这篇记者来信发表十多天后，官方最权威的舆论喉舌《人民日报》于4月23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以杭州大学“文革”中那次“活人展览”为例：说明彻底否定“文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称：“活人展览”“这种践踏斯文、戏弄正义的政治恶作剧，令人发指。”

由于得到“《人民日报》评论员”这样“高规格”的点名，那次“活人展览”便广为世人所知了。

不过，《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都没有说清楚那次“活人展览”是什么人搞的，只含糊其词地说是“进驻杭州大学地理系”的人员，后人将很难理解这“进驻”者到底是些什么人，其实，那些人就是毛泽东下令派出来进驻“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占领上层建筑”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一般简称的工宣队。《光明日报》记者来信中说：“据了解，那位今年五十岁、高小文化程度的原进驻该系的负责人，长期来一直担任厂党委委员兼工会主席。”显然，该人属于厂级党政领导干部，不好说是“造反派”，便只好以“进驻”人员称之。

作为那次“活人展览”受害者之一的著名地理学家、《水经注》研究专家陈桥驿教授，在多年后作了悲愤的回忆：

“这种‘活人展览’，其行径宛如一位难友悄悄与我说的，这是《鲁滨逊漂流记》中描写的生番们在吃人以前的跳舞。《光明日报》著名记者叶辉先生在一篇《‘文革’中在杭州大学搞‘活人展览’的个别人至今仍在坚持极左的错误观点不改》（1984年4月3日《光明日报》，后收入于《叶辉新闻作品集——走向光明》，浙江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报导中，不仅写出了这场持续一个多月的‘展览’情节，而且也记及了我在这场展览中所扮演的角色：‘脖子上挂着串起来的卡片，一手拿剪刀，一手拿胶水，冠之以‘不学无术的反动学术权威’。’在这一个多月里，这种展览有时一天两场（上下午），有时还有夜场。让那些被鼓动而来的观众，一批批前来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每场展出的时间，以观众多寡而定，从二、三小时到四、五小时。观众可以任意动手，对每个‘展品’拳打脚踢。我在受‘展’之时，努力抑制愤怒，而以思考郅学内容排遣……”（2）

发生在美丽的西子湖畔的这种“政治恶作剧”，“文革”中在其他地方也有。

在与杭州并称“苏杭”的另一历史文化名城苏州，当时也举办过这种“活人展览”。陆咸在《迎接黎明》一文中，回忆自己在国民党执政时期从事地下工作以“迎接黎明”的经历时写道：“我在这里要特别怀念汪荣生同志。他是苏州丝织业工人中的地下党员，他是丝织业工人领袖。他领导的丝织业工会完全接受了党的领导，是当时苏州地下党的一支坚强的力量。他为了争取工人的基本权利领导工人开展斗争，多次遭到严刑拷打而坚贞不屈。地下党县委为了迎接解放而设立的临时指挥部，就设在丝织业工会所办的志成小学内。工商自卫队中的骨干力量，很多是由丝织业中的地下党员担任的。这样一位对革命事业作出很大贡献的工人领袖，在‘文革’期间竟被侮辱为‘工贼’，并且在所谓‘阶级斗争展览会’中作为‘活人展览’，受尽屈辱。这真是黑白颠倒，使我今天想起来仍然感到气愤不已。”（3）

在西安的著名画家、“长安画派”的代表人物石鲁，在“文革”爆发时，还在精神分裂症的治疗康复期中，也遭受了“活人展览”的折磨。在张毅的《石鲁传》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一队美协的‘牛鬼蛇神’被造反派们像赶牲口一般，押出了大门，站在高高的板凳上示众。”“每个‘牛鬼蛇神’的胸前挂着一个巨大的黑牌”，石鲁胸前挂的黑牌上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黑画家 石鲁”。在围观者中，有人对他怒骂，有人对他大打出手，有人还向他吐唾沫，搞各式各样的恶作剧。该书还说明：“搞‘活人展览’并非是那些作恶者灵感袭来时的即兴之作，一搞就是两个多月。”〔4〕

在河南省南阳地区，也曾有过“活人展览”，据《中共南阳地方史简编》记载，“文革”结束后，该地区对“文革”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案件进行复查、平反，其中一个大案就是专区医院“活人展览”案。〔5〕

而举办“活人展览”次数多、影响大的，可能要算“文革”中的广西了，当地举办过的一些“活人展览”已经白纸黑字“载入史册”。据《广西文革大事年表》一书记载：

1968年5月12日，广西一派群众组织“联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的简称）总部通过所属组织“沥血红卫兵”（简称“沥血兵”）搞所谓“禽兽展览”（这里的“禽兽”指的是人，即活人展览），“沥血兵”将关禁在“联指”总部的属另一派“四二二”派（“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广西四二二指挥部”的简称）观点的林执真（原区水电厅副处长）、张祖贵（原区地质局处长）、黄海泉（原钦州地区手工业经理部副经理）、谢卓夫（“四二二”派“雄鹰”成员）以及孔祥兴、黄强、张飞、方少华、黎之竞等十人，拉到南宁市北大路建筑研究所，关进木笼，强行组织群众前来观看“禽兽”。展览三天时间，使林执真、张祖贵等十人受尽侮辱和折磨。从此，上行下效，全区不少地方的“联指”组织也搞所谓“禽兽展览”，使一万多人蒙受极大的侮辱和摧残……〔6〕

1968年8月12日，由南宁市革委会和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在区展览馆联合举办的“反革命罪行”展览正式开展。展出时间五十二天。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先后组织全区“无产阶级革命派”489365人前往参观。展览共分三个馆，第三馆是“活人展览”，将攻打展览馆和解放路一带抓走的“四二二”派熊一军等26个“战犯”、“叛徒”、“特务”、“走资派”，挂上黑牌，关在铁笼，当作“禽兽”，让“无产阶级革命派”观赏了五十二天时间……〔7〕

1968年11月18日，所谓“广西大学阶级斗争展览”对外开放，历时两个月，到1969年1月中旬闭馆。全国有25个省、区派人前来参观（区内有77个县、市，16万多人次），展览内容：“教育革命”、“伍修集团罪行”，还有一批教师被当作“禽兽”进行“活人展览”，被展览者被挂黑牌、罚跪、毒打，受尽侮辱和摧残。〔8〕

原中共四川省武胜县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刁锡浦（“文革”时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在《荒诞的阶级斗争展览》一文中记叙了他亲见的当地一次“活人展览”：

1969年秋，全县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进入高潮，……县革委为了总结经验，发扬成绩，扩大战果，某些领导发挥了想象力，挖空心思，别出心裁，创办了一场举世无双的、别具一格的独特展览，其全称名叫“武胜县文教系统清理阶级队伍成果展览”。为了办好展览，集中了全县的笔杆子、美术教师和物色了年青美貌、家庭出身好、政治可靠、口齿伶俐的女教师作解说员；经费充分保证。后来，又分别到全县各公社巡回展出。……

展览会无论从内容到形式，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都与古今中外的展览不同，它的最大不同之点是把人——知识分子——中小学教师当作展品，作为阶级斗争的标本、供人们参观的展品，……不把人当人，侮辱圣贤达到登峰造极。

我有幸参观了部分内容，很多都淡忘了，唯独以我的老师当作展品，我始终念念不忘。当时，我看到我的几位恩师战战兢兢，浑身发抖，我的心灵，震撼极大，我的精神几乎崩溃了。30多年来，我的心日夜不安。我逢人便讲，讲了几十遍，还觉不够。我好像欠了一笔历史旧债没有偿还。（9）

刁锡浦还具体写到了在这次“活人展览”上被充作展品的他的两个恩师，一位是全县有名的语文教师陈言诗，被作为“从严典型”展出。因为陈老师坚持不认“罪”，还要把展览当成向群众澄清事实、自我辩护的机会，展览主办者就配备了专门人员守候在旁，准备在陈老师敢于开口为自己辩解时便动手实行“专政”，一些参观者不忍心看到这种场面出现，不得不绕道走，让陈老师少挨点打。另一位是多才多艺、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的总务主任雷老师，从“文革”前的“小四清”起就挨整，“文革”中又被反复批斗，在“活人展览”中被当作“从宽典型”展出。刁锡浦沉痛地写道：

我去参观时，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还不到半百，乌黑发亮的头发，已经花白，脸上堆满了皱纹，黯淡无光，脸色蜡黄，神色憔悴，两只眼睛没有一点光彩，完全失去了英俊才智的容光。他在解说自己的“罪过”时，小心翼翼，声音细小，嘴唇露出残缺的牙齿，而且身子在微微颤动。看来他并没有在“从宽”中得到安慰，更没有从“从宽”中得到解脱，从“从宽”中得到“从宽”。

我藏在参观的人群中，怕他发现，尾随着参观队伍。离开他时，在这瞬间，老师觉得有点不对，小心翼翼，抬头一看，我们俩的目光突然相碰，火星四溅。老师满面羞愧、难堪、尴尬。而我像做贼一样赶快逃跑，逃得越远越好……（10）

笔者所见到的文字记载中，时间最晚的一次“活人展览”，发生于“文革”后期的1975年10月，在安徽省芜湖地区。“活人展览”的一位受害者陈昭月，不久前在他的博客上写下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1975年10月间芜湖地区公安处一位头脑灵活的科长，发挥才智，紧跟形势，设定了一个阶级斗争教育的新形式——阶级斗争巡回展览。其内容，你一定以为是展出阶级敌人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枪枝、匕首，反动组织的章程、纲领，对社会造成的破坏证据，那你的想法就太保守了。这位科长选的展品是人，是活生生的人。这多生动、多直接、多深刻，多么刺激你的眼球、你的心身，震撼你的神经！

根据他的设计，这个展览是人和画板文字的组合，分近十个展室。第一展室，展出内容是现行反革命，主角是我、陈昭月，用英文写信，叛国投敌，查有大量反动书信、诗文，是蒋匪林彪的忠实走狗；第二展室内容是历史反革命，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只是因为曾任过国民党的一个文联官员，闲居在宣城水阳，只是讲了些不合时宜的话，作为死老虎抓起来了。第三室内容是新生的资产阶级，一个是七十岁的老人，一个是繁昌的年轻干部，只是因为生活宽裕了些，在这个年轻干部家查出一双长丝袜，就成了当时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第五室展出的是泾县乡下的一个富农，解说词说他“深夜读孔孟，时刻想变天”。可怜这个老人，只是识字看书，根本不懂政治。第六室展出的是流氓，是宣城北门一个姓祖的二十岁的好打架青年。第七室展出的是个赌博佬。也许是政治实在让人恐怖、乏味，以后到广德展出时，又增加了第八室，展出的是奸杀亲夫的一对野鸳鸯。这下当时社会万象都有所表现了。

这一干人犯，起初关在芜湖地区看守所，待相关的展板做好，就挂上各类牌子，像珍稀动物却是牛鬼蛇神，正式展出了。这样一批特殊的展品，每一个配一个讲解员，解说词是夸大得

让人怵目惊心的，反正这一班人是不具备暴力倾向的，何况在当时农民难以果腹的情况下对这一班地富反坏、新生资产阶级提供非常规的很好膳食。

清早，看守所门打开，我们就戴好手铐，押至展览地点。接着组织的接受阶级教育的干部、学生、工人、农民、居民，一拨一拨进来了，络绎不绝、川流不息，每日我们接受一百多次批斗。在芜湖历时二十余天，接着周游芜湖地区下属各县。在我受批斗期间，有人故意作态，对我说些愤激的话，有的在离开时，在不被人注意的情况下，向我竖起大拇指。

当时，我曾想，这样的政治活报剧，正如陈子昂所感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想一想我们这一群人遭到的批斗次数，其规模之大其人数之多，一定可以申报世界专项的吉尼斯记录。

时过30年了，这个展览我想虽然大多数人忘却了，（文革十年的灾难也大多被人忘却了）但今天我以当事人身份提来，一定会勾起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的回忆。（11）

严格说起来，“文革”当中举行的各种批斗会，对批斗对象戴高帽、挂黑牌、剃阴阳头、做“喷气式”、罚跪、游街等等，都是搞的“活人展览”（只是有的没有用“活人展览”这个名）。这在全国各地十分普遍，许多报纸上现在都能查到当年的这类报道和照片。例如，1967年1月30日的重庆《新闻报道》（《重庆日报》因被造反派夺权，从1967年元旦起停刊，改出《新闻报道》）发表了题为《山城革命造反派掌权黑市委完蛋》的报道及大会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是前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任白戈被戴上一米多长的纸糊高帽子，由红卫兵反扭双手作“喷气式”状示众，照片的说明文字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任白戈的一副狼狈像”；另一张照片是市委其他领导人站成一排被戴着高帽作“喷气式”状示众，说明文字是：“砸烂黑市委，建设新山城！黑市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混蛋，一个个被红卫兵小将揪将出来示众。”

当年清华大学举行的批斗王光美大会，实际上也是一次以打击、丑化批斗对象为主要目的的“活人展览”。据清华大学的文革史研究专家唐少杰记叙：

“4月5日，蒯大富把中央同意批斗王光美的消息在清华作了传达。”“4月10日一大早，井冈山兵团还是以‘捉鬼队’等为主，把王光美从中南海家中押至清华主楼803室，进行了多次审讯，并逼迫王光美穿上1963年4、5月间她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度尼西亚时所穿的旗袍、高跟鞋、丝袜和所戴的草帽、墨色眼镜，还戴上了事先特别制作的用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实质上，这场批斗大会是通过批斗、丑化王光美来打击、丑化刘少奇。”

“同时被押来参加批判大会陪斗的有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前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北京众多高等院校、前驻北京众多高等院校的工作组以及清华大学的300多名所谓走资派。”

“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人群流动的会场。从北京各处闻讯赶来的号称来自300多个单位共30万人，大家争相挤看被批斗的王光美，不少参加大会的人是怀着好奇心，‘看清一眼王光美而了结’。这场批斗大会是形式多于内容，是清华井冈山兵团配合中央部署的批判刘少奇而演的一出过于戏剧化的闹剧。这次批斗的消息和照片广为流传，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12）

当年“活人展览”的亲见、亲历者们，各自都以为那是当地某些领导人“发挥了想象力，挖空心思，别出心裁”创造出来的，或“发挥才智，紧跟形势”发明出来的，其实，从以上所举事例可知，“活人展览”这种被《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斥为“践踏斯文、戏弄正义的政治恶作剧”的现象，在“文革”中并非只是在个别地方由个别领导者创造发明的，而是在从“文革”初期到“文革”后期的不同年代，在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不同地区都曾发生过的极富“文革”特色的时代“产品”，有的“活人展览”是“文革”初期在党政领导干部的支持或默许下搞的，有的是在党政机关瘫痪之后由造反派群众组织搞的，有的则是由“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或支左部队、公安机关、工宣队，由重建后的党委“一元化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搞的……主办者各有不同，但形式都是一样——以活人为展品。

“活人展览”这种反人性的丑恶现象发生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当中，绝非偶然。长期以来，从“土改”时斗地主，到“三反、五反”时打“老虎”，还有“忠诚老实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运动中，在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中，人类普遍的人性已经被戴上了“资产阶级人性”的帽子而被“批倒批臭”，遭到“全面专政”，讲人性成了可耻、可怕的事，蔑视和践踏人性反而会受到鼓励与表彰，一切善恶、美丑、好坏、对错都以“阶级”和“政治路线”为标准来划分，人们普遍接受的教育是反对宽容，强调斗争，鼓吹仇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酷”，不但要“宜将剩勇追穷寇”，还要“痛打落水狗”……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即使比“活人展览”更丑恶、更令人发指的现象，也完全可以打着“革命”的旗号堂而皇之地“闪亮登场”了。

- (1) 宁波市文化局主办《宁波文化网·文化快讯》，2005年12月11日下载
- (2) 陈桥驿《郾学札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4页
- (3) 《苏州杂志》1999年第2期网页，2005年12月13日下载
- (4) 张毅《石鲁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281—282页
- (5) 见南阳市人民政府主办、南阳市信息中心管理维护《中共南阳地方史简编·第七章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网页
- (6)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一版88页
- (7)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一版117—118页
- (8)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一版132页
- (9) 刁锡浦《荒诞的阶级斗争展览》，未刊稿
- (10) 刁锡浦《荒诞的阶级斗争展览》，未刊稿
- (11) 宣城论坛 / BLOG / 陈昭月，2005年12月11日下载
- (12) 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52—53页

~~~~~  
【难忘岁月】

回忆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  
——一个保守派的自述（之九）

• 刘光耀 •

二十二、上书毛主席

我从来没有悲观过，总认为终究会有落实对待我等的政策的时候。可是，1974年的暑期，我变得悲观了。“杀妖风”、“批林批孔”，实际上是造反派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批判、打击不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批判、打击“老保”头头和骨干。我有些失望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被糟踏成这个样子，党和国家还有希望吗？我茫然，我懵了。开学返校，有人说我的头发白得多了。

面对在开封师院的处境，我想，我才38岁，从党的事业出发，要想能够做些事情，继续为人民服务，还是换换地方为好。于是，在1974年8月底，就以“家分三处，母亲有病，爱人不愿来开封”为理由，向系领导提出了调动工作的请求。数学系党总支、革委会，很快就开会作出了决定，同意我走，并让我自己去联系（暑假期间，系里已经同意李天增调离，他去了郑州工学院；当时系领导连会都没有开，只是彼此说一下就放人。而对我，还开了个会）。我便跑到郑州大学数学系，该系负责人当着我的面给郑大人事处写了报告。一周后，开封师院接到了郑大的商调函。但院领导不予研究。我得知后，问系党总支书记：“为什么不研究？”答复说：“我刚通知你去联系，路上碰见了×××（党委组织部长），我向他汇报了这件事。他批评我：咋不事先打个招呼？他又说，不要紧，咱不放档案就行了。”我立即去找主管人事的党委书记杨纪高，杨说：“我不和你谈”。我问：“为什么？”杨答：“你不就是想调走吗？我不和你谈这个事。”我硬不走，非和他谈不可。他很干脆：“不要再说了，是我不让你走的。”他还告诉我，要求调走最强烈的是宋子宏（政教系总支书记）、李天增和你，李天增已经走过了，不能再让你们走了。我说：“那我咋办？”我又复述了我调离的理由。杨说：“你的情况我清楚。动员你爱人来开封，工作由张敬中（杨的夫人，中共开封市委宣传部部长）给安排。”我实在扭不过他，悻悻而归。没过多久，郑大传来消息：开封师院一位领导亲自向郑大一位领导说，刘光耀这个人如何如何，于是，郑大领导又表示不愿接收我去。

天啊！我居然混到了这步田地，该如何是好？！

想来想去，想到了一条路，不管这条路走通走不通，我只管走！

10月8日至13日我起草了给毛主席的5千多字的信。信中说：

“敬爱的毛主席，我现在的处境简直是：留，‘无容身之地’，走，又‘走投无路’。无可奈何，‘逼上梁山’，只好打扰您老人家，向您老人家直接反映。我觉得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问题。至于我个人，再孤立，就是孤立的像开封铁塔顶上的避雷针那样；再粉碎，就是粉碎的像空气离子那样，也无关紧要。只要党的路线能够得以贯彻，革命能够取得胜利，我就感到欣然自慰。……有些人却唯恐天下不乱，不讲路线，不讲党性，不讲团结，不讲顾全大局；或则讲路线只讲一次站队，而不看变化发展，讲团结只讲某一派内部‘不要分裂’，而不管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有人只想自己的官禄享受，而不顾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冷暖。当然，这一些也只是支流，但它却干扰了党的路线的贯彻，破坏了革命形势的发展。最近，某些领导开始讲团结了，然而也只是空喊口号而已，不见措施如何。”

10月17日，把信誊抄完毕。但怎么个寄法？想了三天，想到江青常和主席见面，谢静宜又常和江青见面，就给谢静宜写了封简信，说：“我给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不知该如何寄法，因此就寄给您，劳您转给敬爱的江青同志。”当日发出。

不知道信是否退转给了开封师院党委。似泥牛入海。

10月18日下午，听传达10月11日的中发〔1974〕26号文件。文件是强调安定，强调团结的，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我把文件全文抄录了下

来。其实，4月和6月，中央发了12号和17号文件，都是强调要牢牢掌握批林批孔大方向，强调全国要稳定，但一些领导就是不听。

11月3日，传达了豫发[1974]32号文件，和中共中央26号文件精神一致，其中讲到“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动不动就打倒，或者‘打不倒也要赶跑，赶不跑也要搞臭’……”我做了大部分摘录。

接着，杨纪高带领党委常委王希灿和院办公室主任王吉东到数学系蹲点。在系党总支委员会上，杨说：“全体总支委员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不能让刘光耀走。让他走，我们要犯大错误！”我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惊讶：我一个普通教师，连党员都不是，走了，你们会犯什么大错误？在他们蹲点的第一次全系教工党员会上，杨问：“你们说说，刘光耀为什么要走？”王丽敏反问：“刘光耀为什么要走，您还不知道，还用问俺？”杨等召开了四次数学系教师、干部座谈会，我参加了一次，但未发一言。总支书记朱骏舟于12月21日向全系汇报党总支、革委会学习省委32号文件的情况，谈到了一些问题。至此，我思想上的压力才略感减轻，虽然还有许多同志不敢说话。

### 二十三、“轻松”时段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接着，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月中旬，召开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任命邓小平为副总理。会后，决定由邓小平主持党政日常工作。

自1975年起，我不挨批了，进入了相对“轻松”时段。整个中国，仍在沉重地滑行。

5月至9月初，我去偃师参加师训班，政治未过问我，我也不过问政治。

8月，中央领导人纪登奎在郑州铁路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河南省委作了《关于增强党性，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10月，原来不敢说话的人虽然谨慎，但还是说出了不少心里话。于是造反派的一些人，就又感到“受压”了。

纪登奎在8月讲话中提到1974年夏，河南省高校已经毕业离校的一部分造反派骨干，又调回学校干扰了高校的工作。这种现象在《大参考》中被称之为“回潮”而披露。纪要求他们中的表现不好者重新调离高校。这帮人对纪的这个讲话极为反感。11月16日，开封师院贴出署名大字报《诗预告》：“有心卷铺盖 / 无言对铁塔 / a 首告大地 / 哑吧要说话”。17日，一位未署名者在前诗旁用铅笔写了A)、B)两首诗，B)诗名《也评〈水浒〉》：“滔滔黄河边，巍巍铁塔下。师院正上演：‘宋江打方腊’”。28日，《诗预告》的作者贴出大字报《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说现在师院是“好人受气，坏人雀跃”。还有人说：“叫这批人走，是惩罚。”“为什么只叫这些人走？清一色！”“这样叫走，就不会安定、团结！”与此同时，数学系革委会主任对我说，他回来前见了陈红兵，陈对他说：“让这批人回校，是按江青的指示，是为了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三结合领导班子。”他还告诉我，陈红兵“听说刘老师被结合到院党委了”，要我“和刘老师搞好团结”。其实，我这个“刘老师”还不是共产党员呢，可笑的误传！

不久，朱骏舟征求我的意见，问数学系“回潮”的，哪些可留、哪些可走？我答：“我不知道啥叫‘回潮’，但我认为马国强（66届毕业生）不属于纪登奎讲的那类。马国强毕业后分到黑龙江，去年调回开封，还未往下分配，是陈顺卿提出从市内调回咱系的，还征求过我的意见。马国强业务好，又没有什么过火言行，请把他留下。”

12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12月10日,中央发了26号文件,点名批判清华大学刘冰等人,说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并公开点名批判教育部长周荣鑫。省委书记刘建勋在12月19日发表长篇讲话,贯彻这一精神。

1976年2、3月份,开封师院和全国一样,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2月4日数学系贴出16名教师签名的大字报:《从数学系看王燕生与右倾翻案风》(王燕生是院党委书记),不点名地揭发了陈顺卿的“翻案”言论,如陈曾说:“批十七年……,十七年都错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没有一点?”等等。

我正在教课,不大关心政治,也没有可被抓的辫子。有人把纪登奎《讲话》印发给各教研室,让批判。一天早晨,从郑州调来数学系的王业振(中共党员)边泼洗脸水边高兴地告诉我:“光耀,昨天晚上我学习了纪登奎的讲话,讲得很好。”我说:“人家叫批判哩,你胡说什么呀?”王又说:“你们怕,我不怕。我造反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政教系组织批判了王燕生大会,其间批到纪登奎。王立即表态:“批判我,可以;批判纪登奎同志,我不赞成。”

还有一些人贴出批判刘建勋去年12月19日讲话中捎带批评某些造反派头头的大字报。

纪登奎和刘建勋本来都是支持河南造反派的省委领导,但在去年说了一些批评河南造反派某些破坏安定团结的头头的话,倒又成了宋江式的“投降派”了。这也是某种政治逻辑的效应。也有人为纪登奎关于“回潮”那段话辩解的,如说“纪登奎讲的是气话”。

75级学员中有一部分基础特别差,有的只读过小学四年级,硬说 $1/2 + 1/2 = 2/4$ ,承认不懂得 $1/2$ 是什么意思。系里决定分出个小班,从初中的代数、平面几何补起,由辛未老师和我承担,一直把微积分、解析几何讲完。6月份,系里决定让我暑假后去农场劳动半年。学员对此决定很有意见,找朱书记吵闹:“说好的,让刘老师把课讲完,为啥中途变挂?”

## 二十四、巨星的陨落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噩耗传出,整个国家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从党内军中的老干部、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到普通老百姓,大都为失去自己多年来的总理而感到难过,并且对眼下的时局忧心忡忡。人们自发地展开各种悼念活动,设灵堂,戴白花。特别是当周恩来决定不保留骨灰的遗言传出后,更是在无形之中增添了人们心头的悲情。社会上自“文革”以来积聚压抑已久的不满和反抗,迅速聚集在悼念周恩来的旗帜下。北京百万人在凛冽的寒风中肃立街头,哭送周总理的灵车,就突显了这种社会情绪。

开封师院大礼堂举行了悼念活动。我一进礼堂大门,从二道门看见主席台上悬挂的周总理遗像,情不自禁潸然泪下。许多人泣不成声。

在批“投降派”的浪潮中,开封师院数学系一位学员干部、中共党员,散布了许多攻击周恩来的言论。当同学们质问他为什么不参加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时,他说:“中央不让悼念。”引起了同学们的公愤,几乎挨揍。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我正在家修宅推土,听到远处广播里传出的哀乐声,

谁死了？放下车子静听……，听清了。“毛主席逝世了”，我告诉家人，“我明天回学校”。偃师一位放羊老汉听到消息，放声痛哭。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从听到消息，到在开封师院大礼堂、市内相国寺，参加吊唁活动，都未曾掉过一滴眼泪。我和毛主席没有感情吗？绝对不是。我在入党申请书等很多文章中，都深切地表示过，我和母亲对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解放我们的感激之情。1968年，我曾两次痛哭毛主席像，但是，毛主席逝世了，我怎么竟然没有一滴眼泪？！我发现许多人不悲伤。

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的诸多事件及其对我的刺激，使我对毛泽东的崇拜发生了动摇。毛泽东走了，我既不震惊，也不悲伤，而在脑子里倒闪出了一个怪命题：毛泽东要是在他还未来得及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就走，该多好啊！

被一些人尊奉为神的一代“风流人物”毛泽东走了，比中国历代帝王都厉害的“当代帝王”毛泽东走了，撤下中国这个烂摊子的毛泽东走了。毛泽东时代结束了。

今后中国将向何处去？究竟谁会出来收拾中国这片江山？是代表造反派势力的一帮人，还是周恩来式的、掀动“二月逆流”的那帮人？多天来，我阴沉又时而激荡的脑子里，一直在思索着这些关乎国家命运的大问题。看来，要有一场恶仗要打。我忧虑着，也略带兴奋地企盼着。

## 二十五、闻讯“四人帮”倒台

1976年10月的一天，正在尉氏农场劳动，听说永兴公社挂出“打倒‘四人帮’”的标语。相继又听到许多谁也说不清楚的关于江青等的传闻，人们到处小声议论着。我不明真相，决定请几天探亲假。

在开封见到田继善等人，和我一样，均无确凿消息。田也请假探亲及联系工作调动。我们到郑州找借调到省教育厅的左德有。晚上在左德有处听到了较详细的消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远，还有毛远新，被抓起来了。郑州人很活跃，到处私下议论。听了以后，我连续长吸长出三次气，好半晌无语。回到旅社，我们议论起国家形势，很快议论到我们学校、我们系。仔细分析了数学系造反派的每一个成员，还分析了总是“左派”“积极分子”的某些人。我们两个观点完全一致。最后得出结论：数学系没有坏人，大家意见最多者也是我们的同志，都要团结，不能再互相打击了。议论到天将亮，才睡了一会。起床后，继善说：“我快到家（荥阳）了，你先别回家，返回开封，代表咱俩向党总支表明我们的立场、观点，坚决拥护党中央的举措。”

我返回师院，在数学系党总支副书记、工宣队员徐汉周住室，见党总支委员陈顺卿正和徐师傅高兴地议论着。我非常严肃地说：“昨天晚上我们在郑州听到了比较详细可靠的消息，继善让我回来代表我们两个向党组织表明态度，坚决拥护党中央的举措。”然后我又说了我们对系里一些人的分析结论，徐、陈完全赞同。

## 二十六、平反昭雪

1978年底，开封师院党委决定平反冤假错案。在大礼堂召开平反昭雪大会之前，先在小礼堂召开被平反者座谈会。会议主持人宣布开会，请李林书记讲话。李林站起就问：“刘光耀同志来了没有？”我站起来回答：“来了。”李说：“啊，你就是刘光耀，我还不认识呢！”可不是嘛，李书记来师院工作两年了，我从未登门拜访过。我认为，没有必要找院领导，我一个普通百姓，又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没有要事反映，何必给领导找麻烦。该解决的问题，不用找，自然就会解决的。在系里也是这样。从1967年春，军代表进校以来，系里的一把手已经换

过八个了，我从来没有找过系领导，都是他们进系一个月以后找我谈话，此时，他们已对我了如指掌。

开封师院共平反群体冤假错案九起。翟克让和我是1968年“为‘二月逆流’翻案”一案的代表人物，翟是干部代表，我是教师代表。在全院大会上宣布平反，党委发了文件。

我等无名之辈被平反了。其实，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的反也就自然被全国的大局势给平了。发不发文件，开不开大会，都无关紧要。况且，人家造反派的“革委会”不是也没有用文件形式给我们戴“反革命分子”之类的帽子嘛。我们的要求实际上很低。除了对不管哪一派的极少数作恶多端、触犯刑律者应惩办之外，我们广大干部、群众能够不再互相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能够互相团结，各就其位，各司其职，为着共同的总目标奋斗就行了。

我们这些下层人被平反了，上层呢？刘少奇到底怎么样？我还惦记着他呢。在一次教研室会上，我说：“刘少奇只要不是叛徒，就应该平反。什么‘内奸、工贼’？说得通吗？‘叛徒’的证据可靠吗？”与会者无不赞成我的看法。到了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刘少奇被彻底平反，我和许多人的心病祛除了。

可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究竟该如何看法？1977年7月份，在数学系控诉“四人帮”罪行的大会上，我发言时还就“不敢说我挨打”的话，说“怕人家说我‘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不能正确对待群众，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呢。1981年6月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解决了这个问题。否定“文化大革命”，对于全中国人民的思想，是一次大的解放。从此，人们基本上可以安居乐业搞四个现代化了。

十年动乱，我经受了锻炼，十年浩劫，我经受了考验。我和大多数中国人民一道，为抵制极左的法西斯对中国人民的肆虐，做出了应有的努力。我不后悔。我只是经常想念我那因受“文革”恐怖而患心脏病且最终因心脏病去世的母亲。

痛定思痛。

据传说，中华民族的祖先炎、黄二帝，就各领一班人马互相争斗；其历代后裔亦互相残害。近现代，除了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国内战祸的伤痛尚在老年生存者的记忆之中。

这就是历史，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主部！

作为现代最先进的党派——中国共产党，效法斯大林统治的苏共在其党内大肆屠杀斯大林的政治对手，在中共党内也（有所“创造”地）屡生同党相残的悲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肃AB团”，三十年代末的“肃托”，四十年代前期的肃反“抢救”运动；中共高层内部的“路线斗争”接连不断，五十年代末庐山批判彭、黄、张、周，接着在全党大抓“大、中、小彭德怀”，及至“文化大革命”，更是大批大斗“大、中、小刘少奇”，把偌大个中国几乎斗出地球了！

这就是历史，几乎是最先进的中共的历史主部！

同族，同党，相煎何太急！？

世界要和平，中国要安定要发展。富强、民主是中华民族的渴望！

要反思，中共党人要反思中共历史，以史鉴今，使今后的路子走正。

(全文完)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yz-info@cnd.org](mailto:hxy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